

中国如果不在制度上做大的变化,体制方面不取得大的进步,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正视结构性问题

中科院兼职教授 高峰

据 4 月 24 日中国网报道,各省份近日陆续发布了一季度 GDP (国内生产总值)“成绩单”。截至 23 日,已公布数据的 20 个省份中有 13 个省份的 GDP 同比增速低于去年同期,显示经济复苏势头仍缓慢。

在去年第四季度 GDP 终结连续 7 个季度的跌势后,中国经济增速在 2013 年第三季度再度出现放缓态势,低于市场普遍预期。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一季度经济增速意外回落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¹最大挑战,即投资效率的下滑。

他表示,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依然稳健,但其为经济带来的附加价值一直在减少。特别是尽管经历了近期的库存调整周期,一些关键行业(如钢铁、水泥等)的产能过剩现象依然严重。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国企在某些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仍然阻碍着私人投资的进入并对投资回报率造成了拖累。经济再平衡,特别是投资效率的提高仍未出现。

根据国际经验,新兴市场国家人均 GDP 突破 1000 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 1000—3000 美元的“起飞阶段”;但人均 GDP 到 3000 美元附近,快速发展的同时自身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克服发展中国在这一个阶段上面临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今,已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迟迟不能自拔。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在上世纪 70 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如今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 GDP3000—5000 美元的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而东亚的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虽然也经历过短期停滞甚至倒退,但在实行了适当的改革后成功起飞,分别持续了将近 10 年的高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都已经突破了 2 万美元,成功跻身于“高收入行列”。

中国当下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迎面而来。身边既有失败的前车之鉴,亦有成功的经验。中国能否借鉴这些先例,摆脱陈旧增长模式的沉痾,实现新阶段的持续增长,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中国当下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迎面而来。身边既有失败的前车之鉴,亦有成功的经验。中国能否借鉴这些先例,摆脱陈旧增长模式的沉痾,实现新阶段的持续增长,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能否跨越陷阱？

面对“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

究室副主任吴庆直言不讳地表示:“从当下的状况看,中国如果不在制度上做大的变化,体制方面不取得大的进步,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虽然这样的判断比较负面,但吴庆坚持认为,如果中国不有所作为,现在的收入水平甚至还会倒退。

这样的判断也许并非危言耸听,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诸国就是鲜活的例子。阿根廷在 1964 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 1000 美元,上世纪 90 年代末上升到了 8000 多美元,但 2002 年又下降到 2000 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 2008 年的 8236 美元。即便是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近邻韩国,人均 GDP 也曾²在经济转轨时期出现过两年的负增长。

按照人均 GDP,中国现在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是经济增长的转换。只要改革坚持沿着更加市场化、更加多元的体制迈进,中国有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的福利效应层面讲,中国亟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低下与不公。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转换成广大民众可享受的福利效应,中国³⁴转换才会有实质性的飞跃。

有学者称,中国有保持 10 年 8%高速增长⁵的潜力,可能在未来 5 年将经济规模扩大到 15 万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但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少数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有效治理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则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偶然事件的爆发,都有可能演变成系统风险。

事实上,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纵观陷入或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验和教训都有。掉入陷阱的如南美诸国,民粹主义盛行,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仍在加剧;如过早进行资本开放的泰国,对国外经济的依赖过于严重,这为其金融系统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同时亦有成功经验者,比如上世纪 70 年代韩国的“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后来韩国政府将发展方向从扶持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明确提出

无经验复制

客观评估区县国有资产的金融潜力、有效提升区县国有资产的融资能力,合理、有效融资,进而盘活存量资产——

提升区县国有资产融资能力的现实路径

和君咨询高级咨询师 王磊

与中央、省市国有资产相比,区县国有资产一直存在经济规模不大、产业结构不优、盈利能力不强的情况,同时由于国有经济的定位属性,长期以来被纳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承担了较高的负债率和偿债压力。而在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高企、财政收入减速的背景下,债务压力、融资困局叠加原有的经营困境,使资产运营变得难以维系。因此,客观评估区县国有资产的金融潜力、有效提升区县国有资产的融资能力,合理、有效融资,进而盘活存量资产,成为区县国有资产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金融角度讲,不管是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两类融资方式,还是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两类融资工具,抑或是银行、保险、信托、交易所等多种融资渠道,所依托的无非是资产所能创造的现金流和预期收益,若脱离区县国有资产的现金流创造能力去进行资金融通,不仅使得资产低估、融资受限,而且可能忽视了更为重要的资产经营。因此,只有真正认识资产的现金流创造的能力、水平和源泉,才可能有效评估区县国有资产的金融潜力,才可能给当前资产带来合理溢价,才可能有的放矢、看准资金偏好、以更低廉的成本融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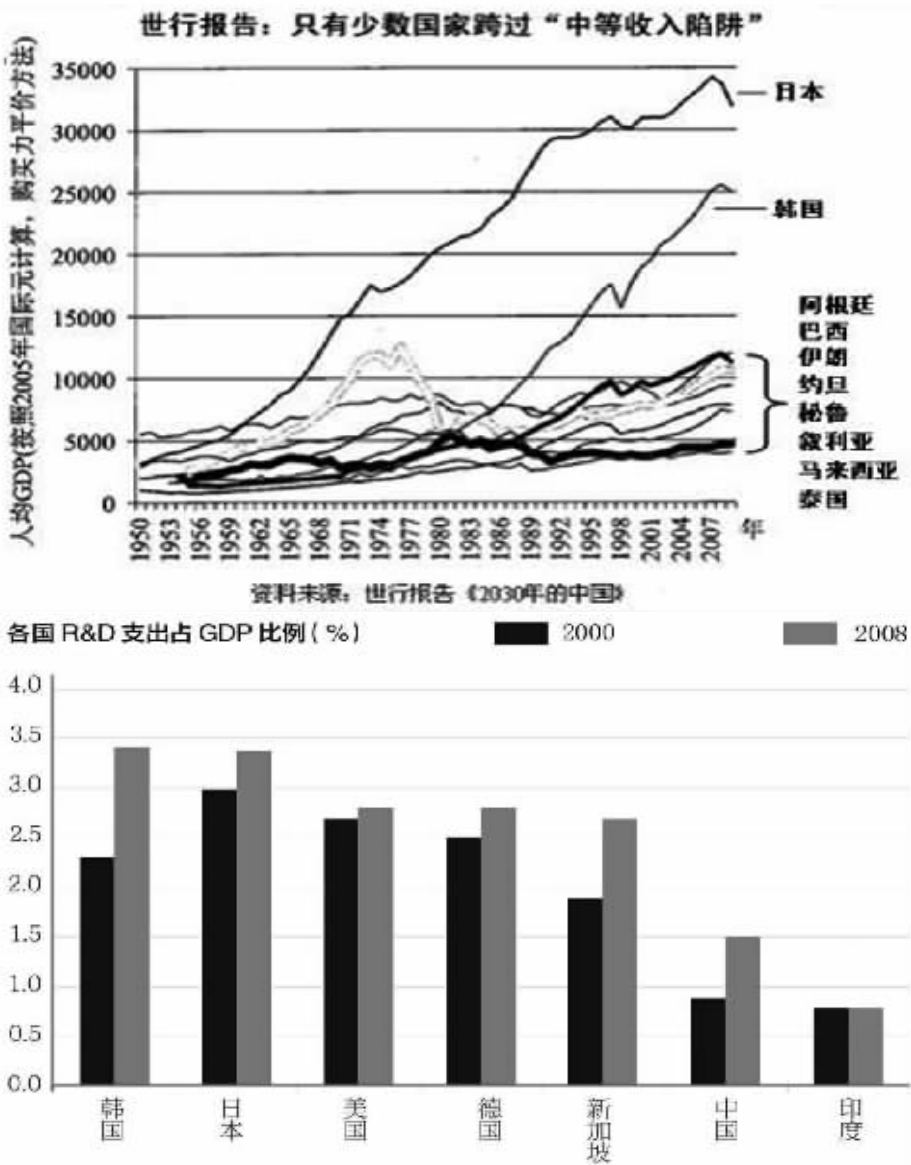
提升现金流内生能力

区县国有资产一般存在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性住房开发、产业园区运作、商贸网点经营等类型。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发和产业园区运作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加之产业分布较散,缺乏应该有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盈利能力较弱。商贸网点经营则由于显示公平的历史租约、巨大的内部寻租空间,存在经营的低效率,部分地段优越、需求旺盛的物业资产未能创造对应的市场收益。以上原因加之不断加大的城区建设任务,使得区县国有资产在资金运用上一直捉襟见肘。

就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发、产业园区运作等具有公益属性的资产而言,一直被认为产业链条过长、产业分布过散,分散了国有资源的配置、降低了国有资本的竞争力,殊不知国有资本的竞争力本质上并不为这些因素所左右。而产业链条过长、产业分布过散,恰恰使这些区县国有资产走在了价值链竞争的正确道路上。全价值链经营的特点是对价值链的控制能力强、能赚取整个价值链的利润,适用于产品标准化、竞争程度弱的行业领域,而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发恰恰具有这样的特征。

以保障性住房开发为例,区县国有资产往往具有土地一级开发、二级开发、建筑工程、园林景观、装饰装潢等全价值链的业务,通过整合相关资产,实现协同效应,能在保障性住房开发过程中,获取多个环节的利润,同时提高了国有资产的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根据财务管理的杜邦分析公



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韩国用了 8 年。

那么,这些经验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中国可供学习和借鉴的东西非常少,原因在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背后各有原因,而成功跨越的几个国家均为小国经济。

教训方面,拉美国家是典型的案例,但恐怕没有太多的教训可以汲取。很多国家掉入陷阱有各自的原因,但每个经济体各自背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经验方面,成功的亚洲四小龙,他们的经验中国几乎没有办法借鉴,因为他们都是小经济体。最大的韩国现在经济史也只有中国的 1/4。

这些小经济体在出口导向的经济道路上可以起飞,由此跨越中等收入的阶段,其

关键因素就是他们小,出口导向型的跑道就那么长,小飞机可以飞起来。小经济体在出口导向型道路上,很快会遇到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不够了,二是土地价格快速上升。小经济体人口小,国土面积小,增长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就会上涨,市场力量就推动他们摒弃出口导向型的道路。但是大经济体这两个优势一直迟迟消耗不完。

那么,中国该如何寻找出路?首先,应从制度层面好好想一想,有哪些阻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因素。

中国当前的增长方式对刚进入世界市场的中国是一个好的选择,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应该换一条道路。出口导向型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海外市场已经无法容纳我们了。小国靠世界市场,对于大国不可能。从市场经济需求的层面讲,必须自己修

跑道,自己要开拓市场。

当下中国已经有可以炫耀的资本,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并不能掩盖已出现的巨大风险。且不说在支撑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制度和技术的任何一方面,中国都没有骄傲的资本。

顶层设计是关键

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进一步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关键因素。

从亚洲四小龙韩国的成功可以看出,曾经深受军人政治困扰和家族企业控制,之所以能用 8 年时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改革之外,也与韩国执行的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国家发展计划密切相关。

那么,中国有哪些制度层面的问题亟需解决?

结构性问题当下已经十分严重。首先是资源配置在不同所有制方面的存在结构问题,特别是资源要素在民营部门与非民营部门的不平衡。比如,国有部门垄断了上游资源领域,这就导致民营部门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国有部门,进一步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另外,信贷方面,国有部门具有优惠条件,从银行体系的贷款很多都是打了折扣的,但由于投资效率并不高,这就导致其对利率上升所造成的成本压力并不敏感。建议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建立以企业信誉为中心的融资体系。

第二是资源配置在空间领域的结构问题,比如城市不公平地提供公共品服务,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显著。而这种不公平对待,对当代以及下一代人力资本的积累造成了负面影响,进而拖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换代。而解决这些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正是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内外经济的失衡极有可能使免疫能力一直在低水准的中国金融体系,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日益开放与联动的竞争世界中免受外来的冲击。从泰国、菲律宾等南亚国家和地区⁶的教训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独立强大的金融后盾,发生金融风险的代价无法估量。

中国的汇率和利率改革比较慢,无法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当前在美联储掀起又一轮货币宽松政策的情况下,应及时进行汇率改革,提高央行制定货币政策⁷的独立性,以防在美联储突然收紧货币政策的时候,引发对中国的巨大负面效应。

加强预期现金流管理

土地资源的规模属性、资产属性以及现行出让制度,决定了其仍然是区县地方政府最为可靠的融资偿债资源。而区县国

有资产尤其是公益性国有资产定位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民生工程保障,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开发,还是产业园区运作,都将带来一方经济改善和提升,都将带来特定区位的土地资产升值期望,在地方政府政策的引导下,这种预期将变得更为强烈。

因此,对于部分急需建设、融资困难的项目,可建立所建项目与特定土地相对应的制度,向项目承建单位注入部分周围土地资产,以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获得启动资金,充分使用土地增值这个杠杆,利用项目建成后周围土地的增值效应,偿还银行贷款,获取国有资本收益。遗憾的是,土地资产正为众多城市开发商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取得,他们以成片开发的吸引力,一方面要求政策倾斜,一方面整合招商资源,所看中的无非是期间的资产升值预期带来的巨大利润空间。而地方政府进行滚动开发所赖以依附的资源则被低成本转让,造成土地资产的大量消耗。

同时,土地资产的形态在由生地向熟地、房地产转变的过程中,每一价值链环节都将产生市场利润、带来资产增值,应根据项目与资金情况,合理安排一级开发、二级开发、物业持有的时序和比例,尽量避免成本最高、代价最大的生地出让与成片开发。只有区县国有资产的资本的运用符合本地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有区县国有资产最适合成为区域城市发展的运营商。